■上证观察家

消除粮食隐患 农业必须重新定位

在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国际粮食危机逼近等内外环境同时严峻的情况下,我国对农业的定位,应该从解决温饱向农业强国转变,主导思路应明确为工业补贴农业——当然是指在实践中,要切实体现在效果上。这一步做好了,粮食危机与CPI涨速过快问题可望同时得到解决。

⊙褚洪波

愈演愈烈的全球粮食供应紧张态势,已经迫使许多国家为保证自身粮食安全相继禁止了粮食出口。由于大部分地区风调雨顺,我国粮食产量连续四年丰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没有粮食危机隐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粮食安全隐患可能还很大。比如,随着城市化步伐的加快,耕地面积将逐年减少,越来越多的城镇农民将转化为市民,同时,也将吸引大量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脱离农业生产进城打工。即使没有自然灾害,我国粮食供应也呈趋紧态势。

当然,更大的隐患来源于农民种粮积极性的下降和农业生产效率的低下。如果我国农业生产效率能够达到美国的水平,即使全国有一半的粮食产区发生自然灾害,因生产效率提高所增加的粮食供给也足以确保我国的粮食安全。而这个假设的目标正是我们今后必须要努力的方向。关键是这一步如何走。我认为,当务之急是重新定位农业,再依此调整农业政策。

我国过去对农业政策的定位是解决温饱,主导思路是工业补贴农业(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都是这种定位),即以低廉的价格向农业提供生产资料,这种政策定位及联产承包责任制所激发出来的生产热情,提高了农业生产率,提高了农民的收入。1978年至1984年间,我国农民名义与实际收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7.9%和17.7%(两者相差仅0.2个百分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78年时的2.57:1,逐步降低到1983年的1.82:1。这一阶段是农民种粮积极性最高的阶段,它意味着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不与世界其他国家争粮,为促进世界粮价的稳定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但是,随着工业的快速发展,我国对农业的定位悄悄步入了农业补贴工业阶段,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涨,而粮价却不断下滑,最终导致了农民收入的下降和农民种粮积极性的锐减。在1992年至1995年间,农民名义收入年均递增22.0%,实际收入仅递增4.8%,两者之间的差距达到惊人的17.2个百分点。而且,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从1983年的1.82:1扩大到了2007年的3.32:1!

当我们面对由粮价上涨带动的相关物价上涨忧心如焚的时候,对照一下国际粮价就会发现,我国不少粮食品种价格都不及国际粮价的50%左右,而在我国加入WTO时,当时的朱镕基总理最担忧的还是发达国家低廉的粮价对我国农民收入所造成的冲击。这实际上意味着农民的利益在被压缩,而目前的粮价上涨其实是我国对农业过分透支的结果,是对此前对农民欠账的一种补偿。

解决不了农业问题,就无法阻止粮价过快上涨,因为对农业的"补偿"将继续(尤其是在国际粮价以更快速度上涨的情况下),自然也就难以把CPI控制在既定目标之内。而目前,尽管我国近几年来的政策不断向农业倾斜,但基本上都被农业生产资料价格的大幅上涨所吞噬;尽管也强调工业反哺农业,但农业补贴工业的现状并没有实质性改变。因农民种粮亏损,积极性受挫所导致的土地抛荒现象就是一个最直接的证明。有两个数据足可以说明土地抛荒这一问题的日益严重。一是4月24日的《南方周末》,引用江西省宜黄县(农业县)统计局副局长李昌金的说法,该县26万多亩耕地中,全年性抛荒的保守估计已高达12%。另外还有大量农田是三季种两季,两季种一季。二是4月27日央视《经济半小时》对重庆的调查,目前"已有11%的耕地不再种粮。"

在粮食危机逼近的情况下,如此大面积的抛荒现象令人震惊。这是对土地资源的最大浪费,尤其是对我们这个人均耕地面积少(世界人均耕地面积为4.8亩,我国人只有1.3亩)的国家而言,这种浪费令人尤为痛心。为何在惠农政策接连出台的情况下,农民种粮还亏损?因为有个根本问题没解决,即对农业的定位依然处在农业补贴工业层面。鉴于粮食安全的重要性,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对农业的定位都是工业补贴农业,甚至是以工业养农业。比如,英、法等国的农民每年可获得的补贴上限是30万美元,美国则高达36万美元。因此,在国际粮价上涨时,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政府不急不忙——高效率的农业生产使他们有充足的粮食供应。美国农业部预测,2008财年,美国农产品出口将达到创纪录的1010亿美元!

工业反哺农业必须体现在实践中和效果上。2007年是我国对农业补贴力度最大的一年,种粮农民平均每亩地也只得到27元补贴。从效果来看,农业生产资料企业的利润增长率远超过农业生产,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农民,而农村的CPI涨幅持续高于城市,说明对工业反哺农业的定位有待通过对农业更大的扶持力度体现出来。比如,通过对农业生产资源企业减税、免税或财政补贴,降低农用生产资料价格等。

工业补贴农业并不意味着农业可以坐享其成。实际上,我国农业有很大潜力可挖掘。比如,现在应该尽快解决的问题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土地抛荒实际上为农业集约化生产提供了一个契机。在农民不愿意耕种土地的情况下,不如调整农业政策,让农民以土地入股,把土地集中起来进行生产,让他们从中分取红利。这样,既可消除农民的后顾之忧,解决土地抛荒问题,还可以大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使我国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

在通胀压力居高不下、国际粮食危机逼近等内外环境同时严峻的情况下,我国对农业的定位应该从解决温饱向农业强国转变,主导思路应明确为工业补贴农业——当然是指在实践中,要切实体现在效果上。这一步做好了,粮食危机与CPI涨速过快的问题可同时得到解决。

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 为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护航

⊙陈梦根

为保持基础货币平稳增长和货币市场利率基本稳定,中国人民银行于4月24日公布将发行2008年第四十七期、第四十八期总量为1500亿元的中央银行票据。这是继2008年来连续三次上调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央行实施的又一项重要调控政策。

2008年是中国经济发展当中较为困难的一年,政府必须着力抑制投资增长过快、信贷投放过多,以防止物价上涨过快,同时又必须面对受国际次贷危机影响导致我国出口下降,经济增长受到拖累的威胁。为此,货币当局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应综合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为国民经济实现平稳较快发展保驾护航。继调高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之后,发行中央银行票据是目前情况下央行实施从紧货币政策的一个较好选择。

解读和分析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的货币政策,笔者认为主要应关注以下几个要点:

首先,从原则上看,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任务的要求,央行仍将继续实施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8.0%,涨幅比上年同期高5.3个百分点,2月份CPI上涨高达8.7%,3月份CPI涨速小幅下降至8.3%。可见,防止物价过快上涨和经济过热的压力仍然很大。此外,受国际上次贷危机、原材料价格上涨、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困扰,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大,2008年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仍然很大。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当局将紧紧围绕"两防"的要求,继续执行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

第二,考虑到美国、英国等主要经济体受次贷危机等影响,普遍调低基准利率水平,并且市场预期存在进一步降息的可能,国内外利差扩大,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7,升值速度较快,国际上热钱流入的压力加大,这样就限制了央行通过加息来控制信贷过快增长的空间与可能性,央行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将十分谨慎地使用利率手段,央行未来将更多地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再贴现、道义劝告、汇率等组合政策,以稳定货币市场。

第三,在信贷方面,央行将不仅关注信贷规模的控制,还将关注信贷结构,特别是外汇贷款问题。根据央行公布的数据显示,人民币贷款增速在不断回落,一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为27.50万亿元,同比增长14.78%,增幅比上年末低1.32个百分点;一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3326亿元,同比少增891亿元;3月份新增贷款仅有2834亿元,贷款增速降至14.8%,1季度总体新增贷款占全年3.63万亿的36.7%,由此可见,从紧的货币政策已开始初步显现效果。下一步,央行在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过快增长的同时,应该着力优化信贷结构,加大对"三农"、服务业、消费等方面的信贷支持。

值得关注的是,在本币贷款回落的同时,外汇贷款却迅速增加,一季度外汇各项贷款增加488亿美元,同比多增462亿美元。以往,中国人民银行对外汇贷款不作规模控制,但是在当前情况下,央行可以通过道义劝告等方式对外汇贷款适度控制,防止可能存在的投机行为,以稳定货币市场。

第四,货币当局应采取措施防止人民币过快升值。一季度人民币的升值幅度已经破了历史记录,4月10日突破7元大关。如果人民币升值速度过快,在近期世界经济增速放缓、国际大宗商品价格高位运行等多种因素叠加的情况下,可能会超出外贸企业的承受能力,对中国外贸出口造成明显的短期冲击。而且,我国经济增长对出口拉动依赖度很高,本币加速升值会导致出口的快速下降,从而面临经济增速快速回落的风险。

第五,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该协调配合,提高政策实施效果。在实施货币政策时,工具的选择、实施时机及执行效果显得尤为重要。面对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如果紧缩性货币政策过猛,可能将导致经济增长快速下滑的危险,因此,应该寻求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协调配合,例如,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来收缩流动性,抑制地产等领域的私人部门投资,同时可通过加大对农村、中西部地区的投资,扩大政府投资,实现经济"软着陆"。

(作者系宏源证券研究所宏观经济研究员,教授)

公务员薪酬 该不该阳光操作

⊙马涤明

戊子年的这个春天,大上海的十余万公务员正经历着一场力度空前的收入调整"风暴"。从3月开始,他们感情复杂地面对着一份新的工资条。"大幅降薪"的震动,已经在公务员圈内,持续数日而未绝。至于究竟降了多少,缩水幅度如何,到底哪些地方有大调整,对不起,上海市人事局一官员对媒体记者称,规范方案隶属公务员内部事务,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披露的范畴。

查2007年开始实施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规定的政府信息,规定应公开的范围有:"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者参与的"。公务员薪酬来源于财政拨款,那么从理论上讲,凡涉及财政动支的问题都与纳税人切身利益有关,应该让社会公众广泛知晓。当然,条例中这两条规定毕竟还是从大原则上来说的,官员如果认定此事不在条例规定范畴内,我们或许也不必较真。

政府、公务员,是纳税人"雇"来服务的,是纳税人的"仆人",否则,何来"公仆"之说呢?既与纳税人是主仆关系,那么仆人薪酬就应该由主人来定。尽管实际运作中,公务员薪酬制度已经过法定程序的确认和批准,但是公众仍然拥有监督的权利。这里的逻辑非常清楚,仆人是不能自己给自己定薪酬的,更不能随意给自己调整薪酬。从笔者看到相关报道说,此次规范公务员的薪酬,旨在有效遏制津贴、补贴发放混乱的现象,实行统一的补贴项目,将公务员津贴、补贴统一归并为工作津贴和生活补贴两大类。一律取消各部门自身设立的其他名目的津贴补贴——其中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公务员自己给自己私自设立了很多"津贴补贴"项目;而且值得追问的是,这些私设的"津贴补贴"的款项从何而来?

显然,公仆们未经主人许可,自己给自己"加薪";而且"加薪"的钱有些来路不明。当然,谁都清楚,那些来路不明的钱也都有"合法"途径,如报道中说,"不规范背后是部门利益膨胀失控的现实,各部门竞相利用手中的权力取得财政预算外资金,一是各种各样的行政收费项目,主要集中在公安、建设、工商、房管、教育等所谓'肥差'部门;二是下属实体上缴收益,它们在其主管部门的'势力范围'中享受着优先甚至垄断所得的暴利,以上交管理费、承包金及年终机关福利的形式汇入部门利益,成为公务员隐性收入的主要来源。"笔者要说,如果今次上海公务员"调薪"调整的正是这部分内容,那就更没有理由不公开具体内容,拒绝纳税人监督了。

上海市公务员的这场"调薪风暴"体现出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依照人事局官员的观点,如果这种降薪举动只是属于"政府内部事物",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范畴,那么它仅仅是停留在自我觉悟、自我约束的层面上;而这种自我约束下的成果,作为纳税人,我们应该报以掌声,但是从制衡角度来说,又留下了太多疑问,就没有什么理由过于乐观了。

财政补贴或是避免"电荒"的次优选择

⊙姜仪云

进入3月以后,全国电煤供应又出现了紧张局势,煤炭库存再次下降,这意味着电力缺口有可能加大。以广东为例,目前,那里电力供应缺口已达300万千瓦,用电形势依然紧张,并且缺电形势已蔓延到整个珠三角地区。据报道,目前广东已从局部性缺电、季节性缺电转变为全网性、全年性缺电,一些高耗能企业已开始错峰,比往年的迎峰度夏提前了半个月。

漫画 刘道伟

除了煤炭供应再次趋紧因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严重影响着发电企业尤其是火电企业的积极性,那就是煤电联而不动导致的亏损。我国五大发电集团除华能外,其它四家一季度均出现集团性亏损;国资委统计将有七成国有发电企业亏损。在已经披露了2008年一季报的上市公司中,电力行业毛利率10.34%,并以-65.98%的净利润增长率居各行业倒数第二位。

电力企业业绩下滑趋势非常明显,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就可能给发电企业造成重创,最终恶化电力供应紧张的态势。电力企业大面积亏损,与煤电联动让步于通胀压力密切相关。煤电联动机制在2004年首次被提出,当时国家规定,以不少于6个月为一个煤电价格联动周期,若周期内平均煤价较前一个周期变化幅度达到或超过5%,便将相应调整电价。但是,2005年11月,在达到煤电联动条件的情况下,有关部门担心电价上调对下游产业构成实质性影响,因而放弃联动,并于第二个月将煤电联动机制变为价格申报审批制度,煤电联动机制名存实亡。2007年,煤电联动条件再次符合,但由于面临通胀压力,有关部门再次放弃了联动。

电力作为上游重要的能源价格,会直接影响到下游许多行业的成本,产生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而且,电力需求具有刚性,电价一旦上调极有可能引发终端消费价格的集体上涨,加剧通胀压力。据测算,电价上涨1分,CPI将上涨0.4个百分点。目前物价上涨压力明显,2月份CPI指数为8.7%,3月份为8.3%,这说明通胀压力依然沉重,煤电联动的可能性依然不大。

煤电联动是电力企业化解成本压力的捷径,根据测算,1分钱的电价就可消化20元/吨的煤价。由于两次煤电联动先后被终止——如果以6个月的周期来计算,煤电联动终止的次数应该超过三次了,这给电力企业带来了沉重的成本压力。如果这个问题继续拖着不解决,有可能为今年夏天用电高峰出现电荒埋下巨大隐患。因此,在煤电联动让步于CPI的情况下,政府应该尽快通过财政补贴电力企业以化解隐患。财政补贴发电企业,在目前阶段,即使算不上最优选择,至少也算得上是次优选择。

其一,控制物价过快上涨属于有关部门的职责,当这种责任间接由电力企业承担的时候,财政有必要支付电力企业为此付出的成本。尤其是在煤电联动规则因有关部门的意愿遭到破坏的情况下,政府有义务主动承担由此增加的部分成本。其次,我国财政收入快速增长。今年第1季度,我国财政收入达1.6万亿元,同比增长了35.5%。各地财政的增长情况也普遍比较乐观。政府既有必要也有能力对电力企业进行一定财政补贴。

实际上,对电力企业进步补贴,在国际上也是很常见,有的补贴甚至非常多。比如黎巴嫩,每年政府对电力企业投入的补亏资金接近10亿美元,约占该国GDP的4%。在目前电力供应开始呈现紧张苗头的情况下,我国广东省近期批准向珠三角大工业用户收取每度电人民币0.045元的燃气燃油加工费,以补贴省内部分燃气蒸气联合循环发电机组,缓解当地电力供应短缺现象。

既然中石油、中石化,可以因为它们为顾全大局让渡的部分利益获得财政补贴,作为同等重要的电力企业,也理应获得财政补贴。当然,在具体实践中,补贴可以实行中央财政补贴与地方财政补贴相结合的办法,以帮助电力企业弥补因煤电联而不动所导致的亏损,重新激发电力企业的积极性,促使它们全力以赴,保障电力供应。

■专栏

物价控制与股价抑制

在中国的物价上升因子里,有太多的美元因素。而一个紧密相联系的国际间剩余价值转移的路线图清晰地显示:物价稳定的关键在国内供给的增长,特别是食品和能源供给的增长。粮食安全须立足于国内,标本兼治,解决能源问题要有新的战略思维。因为石油石化巨头的业绩因物价控制的政策性原因而大面积下滑,正在拖累系列的利多资本市场政策的功效。

⊙李国旺

笔者在本栏多次分析过,在中国的物价上升因子里,有太多的美元因素。宏观调控,在针对国内因素的同时,要防范国际美元对我国物价政策的侵蚀。为了控制物价上升,从上年年底开始,我国实际上对日用消费品和能源价格实行了行政管制,因而虽然CPI虽然大幅上升,但仍然被控制在两位数里。但是这种针对国内"结构性"原因开出的物价控制的药方能否长期坚持,还得时间检测。

从理论上讲,在既定的需求总量下,商品供给是由企业生产成本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比较决定。如果企业生产成本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生产者就会有积极性生产以获取更高的收益,否则,生产者没有积极性,供给就会萎缩。有人判断当前的物价趋势是结构性的,主要是由于食品能源价格上升影响,表面看似乎有道理。食品价格上升结构中,是猪肉价格上升过快起了主要作用,而猪肉价格上升过快却是由于养猪利润太低,即养猪的农民没有办法获得比打工更高的收益。养猪的饲料成本占其总成本的80%左右,饲料成本中玉米又占主要地位,玉米的价格却由于美国玉米减少出口而上扬。近年来,美国号称要在高油价下减少对石油能源的依赖,宣布要扩展生物能源的比重,因此出口玉米在2007年减少20%左右。石油价格在供求基本平衡下,是由于美元的供求决定的,即国际石油价格在总体上是供求平衡的,之所以出现持续上涨的局面,主要是美国实施了美元倾销政策形成的美元供大于求的结果。

由这样的宏观观察角度去分析,我们碗里的肉便与国际石油价格联系起来了,同时也与美国的产业政策相联系。由此,我们看到了一个紧密相联系的国际间剩余价值转移的几个路线图:

一是因美元倾销而出现的通过消费资料价格上升实现的剩余价值转移:美元倾销—美元贬值—石油涨价—玉米涨价—猪肉涨价—物价上升—提高利率—美元套利。二是因美元倾销出现的通过生产资料价格上升实现的剩余价值转移:美元倾销—美元贬值—原料涨价—出口增长—外汇增长—本币升值—美元套利。其中原料涨价是通过生产体系的价格形式完成了剩余价值的国际转移,同时通过本币升值进行国际套利。

这个路线图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物价稳定的关键在国内供给的增长,特别是食品和能源供给的增长。

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应当采取标本兼治的举措。首先,中国的粮食安全立足于国内,立足于工业反哺农业政策的有效实施。从生产成本的下降上,财政要为农民买单。种子、化肥、农药、水利等,国家要及时为农民买单,而且应立法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当农业生产者有利可图时,才能保证国内农业产品供给的增长。其次,从长远看,现有的农村家庭承包制度需要深化改革,才能与现代规模农业协调,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才有可持续的农业制度保障。以家庭为单位分散的农业组织,无法承接现代农业科技和现代化的规模生产。第三,农业生产制度的深化改革,需要与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结合进行。只有将土地从农民的"保险"概念转变为现代农业生产力提高的基础时,规模农业才有可能出现。实现规模农业的社会基础是农民的社会保障、医疗保障和上学就业保障出现整体解决之时。

再看能源价格问题对物价的冲击。解决能源问题要有新的战略思维。首先是立足于国内,从中国太阳能、水力能、风能上进行技术攻关,提高新能源的转化率,从而扭转能源的命脉为美元掌控的被动局面。其次,通过新能源法的严格实施,引导企业和居民采用新能源。第三,通过技术创新降低单位能耗,减少对石油和煤炭的依存度。当然,这些都是战略层级的措施,从2008年能源价格控制对资本价格的影响看,确实是很明显的。

如果说,因为粮食供应造成的物价问题迫使采取的货币紧缩政策导致沪深股市下跌1000点左右,那么,美国次贷危机造成的损失或者心理压力和资金撤离造成沪深股市又下跌1000点,而股改下半场出现的资本价格定价混乱又导致了行情再下跌1000点。当前能源对物价冲击造成的问题已很严重,即国际石油价格上升导致了国内炼油行业价格倒挂,石油石化巨头的业绩因物价控制的政策性原因大面积下滑,从而拖累系列的利多资本市场政策的功效。

据最近公布的消息,中石化公司今年首季净利润大幅下降超65%,如果刨除74亿元的国家财政补贴,一季度实际已亏损约7亿元。如果国内物价趋势不看好,则今年中国石化的业绩就很难乐观。我们知道,中石油、中石化等能源龙头企业的股价直接影响其它能源公司的业绩表现,而能源行业在上证指数中的比重过大,政策性控制产品因价格原因影响能源行业业绩,确实会严重影响上证指数的真正表现。

由于美元倾销趋势在今年冬天之前不会改变,石油价格上升而国内成品油价格控制政策不放松,市场价格与政策博弈的结果是今年前三个季度能源股的业绩会受到抑制,从而抑制住整体行情的向上幅度。当然这种对行情的不利影响有可能在国家对石油等能源企业的逐月逐季的政策性补助中得以一定程度的化解,特别是银行业业绩保持强劲增长的时候。据报道,股份制银行一季度获得同比一倍多的净利增长,这是在从紧的货币政策下取得的。如果二季度起从紧的货币政策内涵有所调整,即使业绩没有100%的季度增长率,银行股也有可能成为行情发展的稳定器,特别是到了秋季的时候。